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变换术语

后殖民时代的翻译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加) Sherry Simon 编
Paul St-Pierr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权图字：01 - 2006 - 6582

© 2006 by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 =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 (加)西蒙(Simon, S.), (加)圣皮埃尔(St-Pierre, P.)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5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600 - 6635 - 6

I. 变… II. ①西… ②圣… III. 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文集—英文 IV. H05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038 号

出 版 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文雪琴

封面设计：袁 璐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20.25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00 - 6635 - 6

定 价：3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专家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东风	王克非	王宏印	毛思慧
文 军	方梦之	申 丹	申雨平
冯庆华	冯志伟	吕 俊	朱志瑜
朱纯深	庄绎传	刘士聪	许 钧
孙艺风	孙致礼	李亚舒	李德凤
李德超	杨自俭	连淑能	汪榕培
张柏然	张美芳	陈宏薇	陈国华
陈德彰	范守义	柯 平	郭建中
黄忠廉	黄振定	辜正坤	程镇球
谢天振	廖七一	谭载喜	潘文国
穆 雷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现有书目:

About Translation P. Newmark
《论翻译》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G. Samuelsson-Brown
《译者实用指南》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A. Chesterman & E. Wagner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 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

Corpora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F. Zanettin et al.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S. Granger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T. Hermans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 (II): 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

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F. Austerlühl
《译者的电子工具》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 Olohan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 (I): 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 Pym
《翻译史研究方法》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C. Nord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 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第二版)

The Translator's Turn D. Robinson
《译者登场》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 S. Holmes
《译稿杀青! 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 本文库采用开放式结构, 今后还将陆续添加其他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著作。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A. Lefevere

《文学翻译: 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D. Robinson

《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P. Fawcett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as Analysis M. G. Rose

《翻译与文学批评: 翻译作为分析手段》

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R. Ellis & L. Oakley-Brown

《翻译与民族: 英格兰的文化政治》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Schäffner

《翻译与规范》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R. Álvarez & M. Vidal

《翻译, 权力, 颠覆》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 Anderman & M. Rogers

《今日翻译: 趋向与视角》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 Bowker et al.

《多元下的统一? 当代翻译研究潮流》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D. Robinson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 新增: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S. Simon & P. St-Pierre

《变换术语: 后殖民时代的翻译》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 F. Tytler

《论翻译的原则》

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H. Kittel & A. P. Frank

《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D. Robinson

《什么是翻译? 离心式理论, 批判性介入》

—

在文学和文化的演进过程中,翻译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翻译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和政治的影响。Sherry Simon 和 Paul St-Pierre 合编的《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00)即是以这种作用和影响为研究对象的一部标志性论文集。该文集由渥太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用翻译研究的最新理论挑战已被广为接受的后殖民理论,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学以及文化理论,探讨了在马来西亚、爱尔兰、印度、南美等地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最新概况,调查了文化交流、融合、断裂的复杂现象,是当代西方相关研究领域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主编之一的 Sherry Simon 是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法语系教授,为加拿大很有影响的一位翻译家,也是十分著名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批评家,代表著作包括《语言交流》(*Le trafic des langues*, 1994)、《翻译中的性别问题》(*Gender in Translation*, 1996)、《文化融合》(*Hybridité culturelle*, 1999)、《翻译蒙特利尔:在分裂的城市中生活》(*Translating Montreal: Episodes in the Life of a Divided City*, 2006),另外还编辑了《文化转型:魁北克文学翻译》(*Culture in Transit: Translating the Literature of Quebec*, 1995)等等。文集的另一主编 Paul St-Pierre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从事翻译教学,为加拿大翻译研究协会主席。他的知名译作是与人合作的印度第一本现实主义小说的英译本,名为《六又三分之一英亩》(*Six Acres and a Third*, 2001)。

二

本论文集共收文 15 篇。如标题所示,全书的核心词为“后殖民时代的翻译”,核心思想是:后殖民时代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向殖民时代的传统术语和概念提出挑战和质疑,并提出革新的方法。文集按主题思想分为两大部分,然后以作者来分章,一章一文。第一部分题为《(后)殖民主义和翻译的力量》,所收文章聚焦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题

为《谈判的情景》，所录各文侧重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各篇论文的文字风格迥异，研究方法互别，着眼点也各有侧重，但它们都以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题。作为整体，文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翻译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二）翻译的作用是只把奇异而具压制性的东西带给异族文化，还是会作为交流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引发一连串的积极反应和互动？

在殖民时期，翻译体现了殖民者的文化霸权。传教士、人类学家、东方学专家都竞相把与他们所要建构的被征服世界形象相吻合的文本翻译出来。译作使阐释的各种形式成为现实，人们很少去质疑其中所涉及的术语。为纪念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 Evans-Pritchard 而出版的文集《翻译文化》（*Translating Culture*, 1962），其标题显示了一系列的阐释活动，而这些阐释活动的最终意义完全是用殖民者的语言来表述的（Simon, 2000:10-11）。殖民地文化是以西方知识为阐释框架的文本，“翻译”不仅是从特定文本到欧洲语言的转换，还是受强势的西方文化左右，把术语中的异质加以压缩、简化的所有实践活动。

对于殖民者而言翻译是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殖民的主体通过它而被建构。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反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互动过程的全貌。正如 Robert Young 所言，用于描述文化交往的词汇非常有限：

直到最近，文化批评家才开始对文化交流展开描述，通过描述来展现和淡化其生成和破坏过程的复杂性。然而，从历史角度来看，人们却很少关注文化交往、入侵、融合和分裂这些复杂过程的结构特征。（Young, 1995: 5）

Young 在展示最发人深省的文化交往的痕迹时，针对的是语言本身。同洋泾浜（pidgins）和克利奥尔语（creoles）一样，混合语（hybrid languages）体现了语言的相互渗透和在实际交往中留下的印记。

洋泾浜和克利奥尔语构成了两种强势模式，因为它们保留了文化交往的真实历史形式。所谓洋泾浜，粗略地说，是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外加另一种语言的语法，其结构显示出的是一种不同于殖民者支配被殖民者之直接权力关系的模式。（同上注）

文集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出“文化交往、入侵、融合和分裂这些复杂过程的结构特征”。通过对具体翻译场景的研究和分析，我们能更充分地了解后殖民时期文化交流的状况。在文集编纂者看来，翻译研究之网已布满全球，各国学者纷纷展开新的对话。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已呈普遍趋势。由此，无论是对翻译的特定语境的细致考察，还是对产生当今文化动态的历史环境

的全面理解，都成了必然之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理论本身也是受到制约的，而非自行其是。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只能超脱地域、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语篇都在语境中产生，我们对它们的运用也受历史因素影响。跨民族文化的研究似乎总以英语为载体而进行，而世界上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却常被忽略。因此，把翻译放在全球语境下进行研究，这对于文化交流中语言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本文集内容广泛，考虑了地理和语言因素，将翻译作为一面多棱镜，透过它来界定和评价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涵义。印度是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的宝地，而在爱尔兰、中国、加拿大、美国、拉美等地，从文化历史角度切入同样也有助于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术语进行反思和重塑。因此可以说，对于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文学交流中边缘之声的关注，便成了本文集的主线。

翻译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在印度、加拿大、爱尔兰、巴西等国的后殖民语境中产生，后来又受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维系。译者就像文化和经济的调解人，地位常常被边缘化。回顾历史，译者常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处在权力边缘。如果译者地处殖民或新殖民社会，每天还得面对语言交流中的矛盾冲突。译者必须小心谨慎，清楚地知道全球文化交流并非自由循环，而是受贸易路线等因素支配。换言之，译作的被接受程度跟译者的天资逻辑不能成正比，而是受制于通行规则（Frow, 1996）。后殖民主义强调，在商业上，同时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译作的生成与流通依贸易规则和译作所有人而定。

今天，“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已越来越模糊和富有争议。很多人试图从文化和政治分析入手来界定该词，消除误读。那么，为什么本论文集仍沿用该术语呢？Anne McClintock 在评论该术语的论文中指出，即便可能引起争议，我们也不能勉强用其他术语代替。她提出，在研究中应当多用历史性的理论和策略，这样才能对“目前不幸的权力分配”作出更全面的描述（McClintock, 1995: 302）。正因如此，本文集采用“后殖民”之术语和概念，以凸显各文所涉研究内容的历史基调。

三

在翻译学的框架内，“后殖民主义”暗示了两层重要涵义。第一是翻译研究的全球维度；第二是它标示了理清权力关系和他者关系的重要性。本文集的前半部分考察了翻译研究中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这一部分就后殖民模式的知性和德性基础和在特定国家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在《历史、翻译、后殖民主义》（*History, Translation, Postcolonialism*）一文中，Cronin 立足于爱尔兰，把翻译当作规范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过程将殖民地带入“帝

国档案”中,通过分析 Brian Friel 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剧作《翻译》(Translations)和该剧作序言“英国爱尔兰军火调查”强调了翻译、信息收集和篡改三者之间的关系。《翻译》具体展示了英国霸权如何用翻译来“掩饰”其占据爱尔兰领土的事实。

同许多后殖民理论家一样, Cronin 认为翻译具有压制功能,但同时也具有反抗功能。在爱尔兰文学史上,当翻译被篡改时,便拥有强大的创造力,此时没有对应源文本的所谓“翻译”文本便会激增。同时,他也指出,边缘族群的产生常常是迁徙流离、领土丧失的结果,这些人比占主导地位的定居群体更容易受到翻译影响。

在中国,“后殖民”翻译理论又是怎样的景象?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从来都不是殖民地,那么,采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裨益何在呢?这是陈德鸿提出的问题,他在《“殖民化”、阻抗与20世纪中国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使用》(“Coloniz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Uses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一文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西洋货品充斥中国市场,同样,西方理论也席卷了中国学术界,然而,究竟如何选择使用这些理论,是当前中国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在亚洲传播自己的文化模式,使其他国家在文化方面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它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那么,中国这个矛盾体应该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后殖民理论呢?后殖民理论能有多大的解释力呢?在陈德鸿看来,可以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后殖民主义”这个词,取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时代意义,这样或许就较有用武之地了。

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们的看法可分为两派。传统派反对引进欧化结构和表达,担心汉语会因此遭到污染。同时也有许多人驳斥这种说法,认为语言是富有弹性的、开放的。陈德鸿考察了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文化理论中的各种研究立场和观察角度,将各种争端辩论与后殖民理论的相关讨论对应起来,找出其中的相似性。在他看来,语言理论、文化理论和中西方风云变幻的历史政治关系应放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必须指出,陈德鸿对后殖民理论的使用是十分谨小慎微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个案的独特性为后殖民理论研究带来了一缕清新空气,它扩大了后殖民理论的适用范围,使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Diptiranjan Pattanaik 和 Shantha Ramakrishna 的文章试图找出将翻译作为确立文化的途径。Pattanaik 区分“向心型”和“离心型”两种类型的翻译。所谓“向心型”翻译,是将外语译为本族语;所谓“离心型”翻译,则是将本族语的材料译成外语。对 Pattanaik 而言,“向心型”翻译提高了印度奥里雅语的地位。

Pattanaik 以一则有趣的生活逸事开篇,说他曾用奥里雅语为当地一家杂

志社写了一则短篇小说，他的朋友们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故事陈腐老套，而当这则短篇小说以英文发表时，友人们却欢喜雀跃，都说小说体裁新颖、情节起宕、内容生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此则“佳文”恰是那篇不起眼的奥里雅语源文本的英译。Pattanaik 借这个故事说明英语在当今印度仍享崇高的地位，而翻译则能为原文带来无上“光环”。

在奥里雅，翻译从来都享有至高地位。印度各地的文学语言，通过翻译而丰富起来，奥里雅语作为一种方言亦然，而自梵文的翻译对奥里雅语的影响最大。跟“离心型”翻译相比，“向心型”翻译协助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奥里雅文化身份，同时也成了促进民主进程的工具。无论在奥里雅王国的扩张时期，还是在 19 世纪奥里雅省独立运动的时候，“向心型”翻译都巩固了奥里雅的国民性。主要区别在于，前段时期“向心型”翻译的源文本是梵文，而到了后段时期即殖民时期，源文本则是西方小说。另一方面，“离心型”翻译不能起“向心型”翻译之民主化作用，它只能满足国内外西方人士的青睐。它或许能给本来默默无闻的本地作品带来更多的国际关注，但却不能滋养像奥里雅这样的地区性语言。如果奥里雅文学文化想要得到发展，就需要通过“向心型”翻译来吸收外来营养，否则无法成功。

与 Pattanaik 不同，Ramakrishna 提出了“反制性翻译”（counter-translation）的概念。Ramakrishna 认为，“反制性翻译”是反霸权主义的工具。所谓“反制性翻译”，是指在翻译对象和翻译方式的选择上，不受英国殖民影响的翻译。Ramakrishna 分析了“反制性翻译”的文化主权，认为无论“忠实”与否，印度人 Vidyarthi 对 Victor Hugo 小说的改编，或 Premchand 对 Anatole France 作品的翻译，都对印度文学文化的多元化作出了贡献。对法语源文本的选择表明翻译家们有意与英国殖民者的意愿背道而驰。

Cronin 把译者视作边缘群体，与之相呼应的是 Jean-Marc Gouanvic 的观点。Gouanvic 强调在翻译中体现反抗精神。在 Cronin 看来，流浪汉、商人、罪犯以及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爱尔兰天主教徒等社会群体在得到权利的同时，又被迫接受一些限制。Gouanvic 提出了“逃亡者”的概念。他所说的“逃亡者”，是指逃出白人控制，自谋其生的被殖民者。Gouanvic 受 Pierre Bourdieu 的思想启发，提出“翻译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 of translation）的思想，揭露了强势源语文化将社会价值强加于弱势目标文化的方式和方法。Gouanvic 并不想把“逃亡”概念理想化、纯粹化，因为即使成功地从殖民地逃出，“逃亡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仍会受其影响，如许多当代加勒比地区使用法语的作家那样。作为“逃亡者”的译者并不依据市场规则行事，而成了异端，创作出反传统的伪译。他们逾越边界，打破传统的分类系统。对 Gouanvic 而言，“杂合”（hybridity）不过是统治者加强权力控制的面具，而提倡斗争空间则是更有利的范式。

Gouanvic 批评“杂合”是“怪异的融合”，挑战当下甚为流行的观念。Michaela Wolf 和 Maria Tymoczko 曾撰文提倡这个术语。就后殖民研究中政治的影响和对文化权力殖民化的看法等问题，Gouanvic 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 Loomba (1995) 的观点交相辉映。

Elizabeth B. Fitzpatrick 通过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出版局”的调查，分析了殖民统治对于当代印尼文学的重要影响。“出版局”隶属荷兰殖民政府，1905 年至二战期间最为活跃，它的宗旨就是为东印度殖民地的居民出版书籍。Fitzpatrick 纠正了把“出版局”当成印尼现代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错误观点。她提出，文化机构的政治、社会日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有限，翻译造就了印尼文学，而创作和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出版局”在提高欧洲价值观和维持荷兰殖民者权势的同时，也丰富了印尼文化。通过对“出版局”运行机制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看出，在学术界，“小”殖民国家对政策的实施亦可起到平衡作用。该机构颁布了许多语言和文化政策，如组织人员把欧洲经典翻译成马来语。荷兰殖民者通过这些举措来削弱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精神，从而有效控制印尼文化的发展趋势。

Wolf 和 Tymoczko 把“杂合”当作后殖民实践的核心标志。通过研究“杂合”概念，Wolf 超越了有其局限性的“他者”观念，对文化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把变化中的文化差异囊括了进来。后殖民主义可被当作质疑有关“他者”的知识产品的一种阅读和写作。如同人种论，在文化知识产品上翻译同样面临权力的滥用与不公。Wolf 沿用 Homi Bhabha 对“杂合”的定义，认为它是“对主流文化权力的积极挑战和抵抗”，把文化权力从斗争的源头转变成了斗争的结果，认为“第三空间”中，文化可以得到调和、重组进而互渗。“第三空间”是产生文化的空间，在这里翻译是“介入的理由”，所产生的文本既不可被分门别类，也不能被重新移植。在“第三空间”中，文化被重新融合，翻译不再是连接两个不同文化的桥梁，而成了引进新元素的一种策略。协调和融合会促进文化发展，差异与非通约往往支配着文化身份。

全球范围内少数派宗教和移民群体的人数庞大，因而没有固定的族群概念。民族和语言再也不是划分文学群体的标准。例如，最近有一本用法语写成的介绍比较文学的书，在前言中，作者给“外国文学作品”下的定义是“不是为我而写的作品”。他认为凡是用法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其目标读者就只是法语社群 (Chevrel, 1989)。作者忽略了法国民众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到在法语社群中还有阶级、性别、种族的差异。他虚构了一个纯粹的法语文学社群，把混合社群中的法语当作文学研究新的标准，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以语言和文学为着眼点的研究；然而，这些变化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不大。

Gayatri Spivak 从翻译理论家和译者的角度，分析了文化交流中“宗主国公民”、“被殖民者”、“移民”对主体地位你争我夺的复杂情况。她认为“异

域”和“本土”文化的划分过于简单，译者的文化身份既不属于源语文化也不属于接受文化。译作如同移民作家的作品一样，会受复杂的有着多元化民族背景的目标读者影响。在这种新形势下，不同的声音此消彼长。Spivak 从自己作为译者所面临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入手，分析了当今世界文学交流中的各种操纵力量。在 Mahasweta Devi 作品的译序和译后记中，她指出对于不同文本，读者可以靠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对上下文的分析来进行阅读。作为批评家和译者，Spivak 没用“国际”翻译路线，而改之以更具体和更曲折的文化路线。

Salman Rushdie 把移民界定为“被翻译的人”。在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中，个人会被各种文化关系所改变。当到达新环境，面临新问题时，人们的个性和文化身份会被打乱并被重新整合。然而，移民同时也是活跃的文化交流的代理人；他们怎么被“翻译”了，就会怎么去做“翻译”。Rushdie、Édouard Glissant、Derek Walcott 等作家成功地平衡了不同文化族群，创造出新的文学身份，他们的写作既非完全的创作，也非完全的翻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在文本中注入新鲜的血液。

Tymoczko 的研究仍然围绕“杂合”展开，不过她更关注后殖民时代写作和翻译之间的交叉点。有些作品很难判定到底算不算翻译，如 Amos Tutuola 的《棕榈酒醉汉》(*The Palm-Wine Drinkard*)。此书的语言别扭、怪诞，是“为别的语言服务”的异化了的作品。这样的文本不再起“调节”作用，而是将两种文化合二为一，产生新的文化实体。Tymoczko 认为后殖民写作与翻译不同，但两者有相似性。“杂合”文本可以让人同时联想起两种语言。双语和多音使翻译和后殖民文本呈现出召唤和颠覆的特点。试举一例，James Joyce 通过专有名称，“隐晦地”使用了爱尔兰语言。20 世纪北非后殖民法语文本亦有此类“杂合”现象。双语读者的阅读经验与单语读者不同。“传统的翻译对等”是一种传达工具，它将被殖民者的语言意义植入用殖民者的语言写成的后殖民文本中。翻译和后殖民文学作品在功能和形式上的相似源于“双重意识”和“文化复原”(cultural recuperation)。

跟陈德鸿一样，Wolf 也论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各种联系。Wolf 指出，帝国的瓦解过程也是非殖民地化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是“破碎的、分散的、疲惫的”残片，如奥匈帝国的分裂。尽管“后帝国主义”和“后殖民”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基本教义、本质主义十分盛行，可外部力量仍起制衡作用。她关注的是这种过程的持续，即“余震”的影响，如帝国分崩离析的多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分裂。

四

文集的后半部分是对介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间的特定文化活动的具体分析。Cronin 在第一部分就简要地讨论了 Brian Friel 的《翻译》，而 Maria-Elena Doyle 再次以此为个案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Doyle 将《翻译》中的方言跟 Friel 等人创办的费尔德戏剧公司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美学实践联系起来。Doyle 特别关注剧作中方言的运用以及对方言的翻译。在北爱尔兰，人们不是使用英语，就是用盖尔语，方言在那里有着怎样的政治地位？Friel 的作品常反映爱尔兰人在国家分裂（南、北爱尔兰）阴影下，所遭受的文化及民族认同问题，创作主题涉及南、北爱尔兰，这使他成为了当代最受赞扬的爱尔兰剧作家。方言在促进文化融合，将混合的文化身份注入北爱尔兰的同时，也提高了公众的归属感。在《翻译》中，语言和口音的选择都独具匠心，指向丰富的斗争性的历史背景。Doyle 指出费尔德戏剧公司的早期 6 部剧作中有 3 部为译作，该剧团的目的就是建立爱尔兰的文化身份。在剧作中语言起着关键性作用，语言不再保持沉默，而是意义表述的核心所在。

Louise Ladouceur 就加拿大戏剧翻译的“双重殖民性”以及特定翻译策略的历史基础展开讨论。她分析了不同的接受语言的地位是怎样来影响翻译模式的，如英语的主导地位、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北美的影响、法语的微弱地位等。当魁北克戏剧被翻译成英语时，译文中会显示源文本的印记。造成的后果是，剧本的名字保持法语不变，因为它是“不可译的”，同时也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魁北克的过去的记忆。这种翻译策略跟改编或用方言翻译不同，Annie Brisset 曾在《翻译的社会批评》（*Sociocritique of Translation*）中以六七十年代魁北克戏剧翻译为个案，得出过同样结论。不过，正如 Ladouceur 所言，到了 80 年代，这种翻译模式变得更加灵活，而对于戏剧作品类型的选择也更宽泛。

Juliana de Zavalia 剖析了美国境内拉美作家的新面貌。她沿用 André Lefevere 的“折射”（refraction）概念，用多元系统理论证明翻译是包括阅读、重写、书评在内的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探究翻译对新移民作家写作的影响。她梳理了 1960 年以来美国文化交流进程，认为其中的新殖民主义色彩比后殖民主义更加浓厚。

毋庸置疑，印度是当今翻译研究的前沿阵地之一。由于印度“文明进程的复杂性”，对它进行研究并非易事。印度拥有古老悠久的文化，现在又奉行多语制，因此，我们对它的文学、文化动态的研究也就不能因循守旧，而应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地运用相关理论。当然，印度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印度是翻译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官方语言众多，对英语又有着特殊的偏好，用英语写成的印度文学和翻译成英语的印度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

Salman Rushdie在《印度文学创作的最佳时期, 1947—1997》(*The Vintage Book of Indian Writing, 1947-1997*)一书的前言中说道, 印度缺少“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最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用英语写成的。他批评用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 认为翻译成英语的文学作品亦十分糟糕。Rushdie指出, “英语文学和印度的其他文学不必对立”(Rushdie, 1997: xvi), 同时还抛出了较为极端的言论, 反对用方言写作。

Anita Mannur 和 N. Kamala 的论述展示了 Rushdie 思想产生的历史和当代的语境, 不过对于 Rushdie 的结论她们并不赞同。两人在各自文章中都指出, 印度与作为前殖民者语言的英语之间存在一种既亲密又抵制关系, 英语在这个语言并不统一的国度中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也是国际商贸、文化的载体。同 Rushdie 一样, 她们认为, 与用英语写成的印度文学作品相比, 翻译文学在印度处于边缘地位。同时, 她们也对产生不平衡的原因提出质疑, 认为翻译可以振兴地区文学的发展。她们所要表达的总的思想都是: 翻译对印度文学身份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用 Kamala 的话来说, 无论翻译是“向心”还是“离心”, 对英语是“阻抗”还是“促进”, 印度区域和国际身份的互动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Paul St-Pierre在他的文章中探讨了后殖民主义的张力对翻译的作用。“法则”和“语言”是带有爱尔兰殖民地痕迹的术语, 也是殖民者主要的殖民手段, St-Pierre考察了这两个术语在奥里雅语小说中的运用以及对它们的翻译。《六又三分之一英亩》是著名奥里雅语作家 Fakir Mohan Senapati 的作品, 在 1897 到 1899 年期间连载发表。1967 年到 1969 年期间共出现了 3 个译本, 从这 3 个译本中可看出译者对殖民遗产所持的态度, 例如译者心中的读者究竟是地区的、国家的还是国际的读者, 英语的权威性又怎样, 等等。

在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里, Probal Dasgupta 从后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言学层面入手, 探讨了知识产生和传递的问题, 还讨论了翻译的道德范畴, 他把这一道德范畴称为“(翻译的)勇气”。他以宣言的形式, 呼吁把翻译当作后殖民世界现代性的保证。现代性要求知识可被翻译, 可用不同语言重新组合, 言之有物, 而非抽象的普遍性话语。通过翻译, 知识可以被验证, 被重置, 并被仔细研究。认知的可解释性是现代性的前提条件。“启始文化”的故事被接受文化所重述, 其中核心思想将被解开。Dasgupta 谈到了两次翻译浪潮: 一次是由官僚发起的传教士的翻译, 另一次是“细心”译者的翻译, 这类翻译因译者的“细心”而产生了距离。Dasgupta 对上述两种浪潮都持否定态度, 而提倡“重新感知”。为了扭转贸易不平衡的状态, 他呼吁将文本更多地翻译到“欠发达语言”中去, 而非翻译到“发达的语言”里, 并认为这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而是为了公众利益。

Dasgupta 在后殖民主义中召唤勇气, 似显得有些理想化。他想要打破控

制我们思想的官僚理性,认为译者的职责是“改变客体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传播学、文化理论应携手对科学事业和政治制度提出批评。文化互动不仅仅是交流形式,更是交流产品。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移而且还是跨语际实践,是穿越语言的写作。文化交流被“复杂的偏轴互动”取代 (Buell, 1994: 337), 于是新的对话和新的立场开始出现。边界不单起分离和排斥作用,它也可以导致“互动和建构” (Buell, 1994: 341)。译者的双重任务是,一边不断地重新定义创作实践,一边改变文化传播的术语。

综上所述,本文集不囿旧说,勇于探索,是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学术力作。在此文集中,研究者们重新梳理了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地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基础上,对文化产品在传输过程中的路线和权力关系进行了规划和描述。作者们从翻译理论和实践入手,重新定义和精炼了现今通行的对后殖民主义概念的理解,通过后殖民和翻译理论重新思考文化关系,对后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反审。文集运用批评的眼光,对传统理论中的种种术语和概念进行了深层的考察,从而为“后殖民时代”的翻译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新的范式和方法。

参考文献

Brisset, Annie. 1996. *A Socio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atre and Alterity in Quebec, 1968-1988*. Trans. Rosalind Gilland and Roger Gannon. Toronto: U of Toronto P.

Buell, Frederick. 1994.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New Global Syste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P.

Chevrel, Yves. 1989.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PUF.

Frow, John. 1996.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New Left Review*: 89-108.

Loomba, Ania. 1995. “Overworlding the ‘Third World’.”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305-23. New York: Columbia UP.

McClintock, Anne. 1995. “The Angel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291-304. New York: Columbia UP.

Rushdie, Salman. 1997. Introduction. *The Vintage Book of Indian Writing, 1947-1997*. Ed. Salman Rushdie and Elizabeth West. London: Vintage.

Senapati, Fakir Mohan. 2006. *Six Acres and a Third*. Trans. Rabi Shankar Mishra, Satya P. Mohanty, Jatindra K. Nayak and Paul St-Pierr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Simon, Sherry. 1994. *Le trafic des langues*. Montréal: Boréal.

Simon, Sherry, ed. 1995. *Culture in Transit: Translating the Literature of Quebec*. Montréal: Vehicule Press.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Simon, Sherry. 1999. *Hybridité culturelle*. Montréal, L'Île de la tortue éditeur.

Simon, Sherry. 2000. Introduction.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Ed. Sherry Simon and Paul St-Pierre. Ottawa: U of Ottawa P.

Simon, Sherry. 2006. *Translating Montreal: Episodes in the Life of a Divided City*. McGill-Queen's UP.

Simon, Sherry and Paul St-Pierre, ed. 2000.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Ottawa: U of Ottawa P.

Tutuola, Amos. 1953. *The Palm-Wine Drinkar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Young, Robert J. C. 1995.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邵璐

香港浸会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

H059/Y15

:28

2007.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变换术语 后殖民时代的翻译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加) Sherry Simon 编
Paul St-Pierr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